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优势学科成果系列

新时代党的建设探微

陈志刚◎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优势学科成果系列

新时代党的建设探微

陈志刚◎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代党的建设探微 / 陈志刚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115-5403-1

I. ①新…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6422 号

书 名: 新时代党的建设探微

著 者: 陈志刚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周海燕 孙 祺

装帧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09 65369846 65363528 65369512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8

网 址: [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28 千字

印 张: 14.5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403-1

定 价: 68.00 元

作者简介

陈志刚,男,1972年10月生于江西信丰,北京大学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党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专著有《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超越》(重庆出版社,2011),《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译著有《哈贝马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反对资本主义》《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重大国情调研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多项。参与、承担中组部、中宣部、中纪委课题多项。其中中组部课题委托课题“党员队伍规模优化问题研究”,结项成果获中组部一等奖。

前 言

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考察,在窑洞拜访了毛泽东同志,二人一席谈话史称“窑洞对”。黄炎培先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同志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同志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同志回过头来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石家庄正定县进行调研之后,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他在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郑重指出:“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进京赶考,人民是考官;能否考出好成绩,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如何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如何解决执政后掌握权力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防止我们的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防止党变质,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孜孜

不倦,不断探索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道路。特别是十八大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校正了党和国家发展的航向,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开辟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新世纪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世情国情党情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挑战,提出了许多党的建设的新课题。2009年以来,我对党的建设问题一直极为关注,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对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党的建设的探索,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探索进行了一些思考。本书的上篇基本上都是2013年以前发表的文章,下篇则是2013年以后发表的文章。目前呈现给读者的就是按历史脉络编排的,这几年来思考的部分成果。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陈志刚于北京

2017年12月6日

目 录

CONTENTS

上篇 关于党的建设的历史探索和思考	1
第一章 反腐倡廉的历史探索	3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探索	4
第二节 改革开放时期反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16
第三节 反腐败的严峻形势和建议	74
第二章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81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调整和吸纳的政党	81
第二节 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91
第三节 切实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注意四个向度	97
第三章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	101
第一节 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新挑战	101
第二节 反腐倡廉建设必须统筹兼顾文化维度和制度维度	116
下篇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探索	127
第四章 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论	129
第一节 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129
第二节 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139
第三节 必须补足理想信念之“钙”	144
第四节 必须注重党员干部队伍素质的优化	153

第五节	作风建设必须抓早抓小、抓常抓长	156
第六节	反腐败必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159
第七节	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161
第五章	坚持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165
第一节	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强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	165
第二节	以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机制保障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167
第三节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171
第四节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贯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 重要原则	172
第六章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	177
第一节	新时代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探索	177
第二节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184
第三节	必须严守政治纪律,不得妄议中央	190
第四节	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	195
第七章	端正党风必须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	207
第一节	识才:以德才兼备为标准	207
第二节	爱才:以良好环境为保障	211
第三节	敬才:坚持“四个尊重”的方针	213
第四节	用才:坚持以用为本	216
附 录		220

01

上篇

**关于党的建设的
历史探索和思考**

第一章

反腐倡廉的历史探索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党自诞生之日起,一直高度重视反腐败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90多年来,党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在反腐倡廉的道路上做了不懈的探索。总结90多年反腐倡廉探索的经验,对于提高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开拓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地破除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同消极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充分重视反腐败斗争,注重党的作风建设,制定了严格的制度。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928年4月,为了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毛泽东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和贯彻,对于正确处理军民、党群关系,培养一支人民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中央苏区时,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开展了群众性反贪污反浪费斗争,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在陕甘宁边区时,边区政府公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公布了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2年至1945年,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进行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公务人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党所领导的这一系列反腐败斗争,为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并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探索

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权力问题是反腐败斗争必须抓住的关键环节,也是民主政治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防治权力的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做了深刻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深入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人民主权,跳出“历史周期律”

“主权在民”是启蒙学者提出的重要论断和进步观念。马克思继承发展了这种观念并把这种观念置于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之上。针对黑格尔用君主主权来混淆和“伪造”人民主权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指出,主权概念本身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对立的存在,“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人民主权不是凭借君王产生的,君王倒是凭借人民主权产生的”^①。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应该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然而,剥削制度下的国家政权,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使广大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备受权力的欺凌、压榨和奴役,“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②。在这种制度中,官僚政客“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③。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导致公共权力异化、腐败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因此,要消除权力异化导致的腐败现象,必须消灭私有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把国家权力还给社会。只有把公权力还给社会,人民才能摆脱权力的压迫,才能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在总结巴黎公社实践经验的时候,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一些实践探索十分赞赏。他明确指出,巴黎公社为了防止“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①马克思认为,以往的社会制度都没有实现人民主权,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普选权实际上仅仅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并没有为无产阶级带来民主。而只有巴黎公社才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破除了一切以金钱、血统为基础的等级制,选举出了真正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代表,并赋予广大工人群众实实在在的监督权和罢免权。巴黎公社“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②,“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③。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毛泽东探索防治权力腐败的新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毛泽东对旧中国的权力专制和腐败现象做了深刻的思考。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有很深的认识。他明确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绝大多数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都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④。而旧中国所谓的各种改革,实质上只是“由强权得自由”,正因为这种强权专制,导致了难以遏制的普遍的腐败。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也没有根除这种腐败,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在抗日战争中出现在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就在于“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败达于极点”^⑤。正是因为权力独裁导致普遍腐败,蒋介石独裁政府在解放战争中丧失民心,并最终丧失政权。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65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①所以,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②。

而要改变旧中国腐败盛行的局面,毛泽东认为,其根本举措就在于实行“平民主义”,让权力回归人民。他指出:“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③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④1945年7月,在延安窑洞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执政——腐败——垮台”历史兴衰周期律的问题时,毛泽东自信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回答,它既是毛泽东长期思索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继承发展的结果,也是对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实践的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基础在于人民,他多次告诫党员干部:“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⑤因此,毛泽东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人民主权”的执政理念,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候切实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被明确地写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之中,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

概言之,在毛泽东看来,为了防治权力腐败,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基本观点。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二、从“三三制”到“三结合”：权力民主的探索

“人民主权”是社会主义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权力行使机制之中。西方发达国家表面上鼓吹普选制和主权在民，实质上实行的却是金钱政治、寡头政治、精英民主，并没有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为了实现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人民民主，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构建一个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掌握权力的机制，避免权力被少数人所掌控，毛泽东在借鉴苏联经验推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外，还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执政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权力民主、权力制约的新模式。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实现权力民主，充分调动各种抗日力量，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思想，要求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的代表在抗日根据地政府各占三分之一。毛泽东认为，党对根据地的领导权，不能依靠人数的优势来实现，像蒋介石政府那样搞独裁，而必须依靠质量优势来实现，靠党的正确政策和有力的群众工作来实现。“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推行“三三制”，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了享誉全国的模范政府、民主政府。“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②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成功实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凝聚了广泛的力量，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全面执政提供了范例。1948年1月，毛泽东在勾画新中国蓝图时指出，未来的新中国将继续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8页。

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①新中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精神在第一届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中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在61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有31名;在6名政府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有3名;在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非中共人士有2名,15名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有9名;政务院32个部级单位,正职领导中党外人士13名,占40%;副职领导人党外人士31名,占43%。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也有一大批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省市府党外主席、副主席54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很多部门当中民主人士任职的比例远远超过了1/3。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民主举措,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献计献策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然而,随着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受到牵连,或被撤职或有职无权,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监督功能几乎丧失殆尽,“三三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毛泽东不得不进行新的权力民主的实践探索,这就是“三结合”。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曾提出:“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②。“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③。毛泽东继承发展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提出了“三结合”的思想。

毛泽东的“三结合”实践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于企业管理层面,即“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认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如何,这不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有关,而且与劳动者能否参与生产管理有关。管理是一种对生产资料甚至劳动者以及劳动产品进行配置、处置的权力,如果劳动者仅仅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而没有处置权、使用权,那么这种所有权、占有权就会被架空、虚化。他敏锐地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④劳动者的管理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①。在毛泽东看来,这种管理权不能仅仅体现为权利,还必须体现为权力,即实实在在的、直接参与的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进行配置、处置的权力。因此,他要求在企业管理中,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不仅使普通劳动者管理生产劳动的权利提升为一种权力,有效制约了官僚主义,避免了劳动群众的边缘化,这对于保证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甚至把这种保障劳动者权力的民主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认为它比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的“马钢宪法”更加优越。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一长制管理方法过分强调了专家管理和官僚管理,把管理当成了专家和工厂领导的特权,而把普通工人排斥在外,不但助长了官僚特权、官僚主义、等级化,而且削弱了普通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积极性。

其次,“三结合”也体现在政府管理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重新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必须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而人员构成则采取“三结合”的方式,由革命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虽然毛泽东试图把革命委员会打造成一个权力民主的机构,但由于取消了法制的保障,并不能真正实现权力民主。

应该说,无论是“三三制”还是“三结合”,都是毛泽东试图破除精英民主、防止权力为少数人所垄断的一种尝试。作为权力民主实现的形式,“三三制”“三结合”就其本身来说,保障了各个阶层代表参与经济和社会管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协商的积极性,避免了弱势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地位。但是,作为一种权力运行机制,其设计在总体上还是比较粗糙的,在操作执行的程序上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总结这段历史经验也要认识到,要真正发挥“三三制”“三结合”的作用,既要加强法律制度方面的保障,也要使其权力运行机制更加科学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